

短篇小说

创作技巧漫谈



I04/34

短篇小说创作技巧漫谈

本 社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7630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南昌

847630

短篇小说创作技巧漫谈

本 社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 万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10·209 定价：0.38元

目 录

主题·题材·剪裁

- 读《内奸》随想.....舒信波 (1)
发现·开掘·提炼
——漫谈《工地之夜》的艺术构思.....周劭馨 (10)
创作的本领 就是发现的才能
——从《班主任》看作家对生活的“侦察”.....汪木兰 (17)

题材、主题与艺术结构

- 读《话说陶然亭》.....帅焕文 (23)
生活史的剪接艺术
——《李顺大造屋》的结构艺术.....吴松亭 (32)
曲终奏雅
——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吴松亭 (39)
“引而不发，跃如也”
——谈《乡场上》的悬念运用.....公 仲 (47)
“巧”在情理中 用在绝妙处
——谈《我应该怎么办？》中的“巧合”.....汪木兰 (52)
颠倒与和谐
——谈《剪辑错了的故事》的结构艺术.....彭广丽 (58)
“水佩风裳，剪裁入妙”
——读《记忆》.....何渊耀 (63)

把刻画人物性格放在首位

- 谈谈《小镇上的将军》里将军形象的塑造……吴松亭（68）
活生生的英雄才是真实的英雄
- 谈《西线轶事》中刘毛妹的性格………周劭馨（74）
通过肖像勾画灵魂
- 当代小说的肖像描写漫笔……………公仲（80）
写出人物的个性
- 谈《潘虎》的性格描写……………彭兆春（88）
人物典型与人情味
- 读《达吉和她的父亲》随笔……………彭兆春（92）
要善于打开人物的心扉
- 读《国际悲歌》一得……………吴海（102）
大笔勾勒与精雕细刻
- 谈《老牛筋》……………汪木兰（109）
对比的妙用……………汪木兰（114）
“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涂吉安（120）
漫谈性格化的语言
- 读《不称心的姐夫》拾零……………舒信波（127）
漫谈“人物的观点”……………周劭馨（135）
- 细节描写漫议……………吴松亭（140）
看似反常却正常……………涂吉安（146）
漫谈对比的艺术表现方法……………仰民（151）
应该追求艺术上的标新立异……………仰民（155）

主题·题材·剪裁

—读《内奸》随想

舒信波

短篇小说的特点，一般是要选取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选择一个中心的故事情节，集中刻划主要人物，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但是，也有不少的短篇小说描写了一个人几十年经历及重大变故，时间跨度大，人物多，反映的生活面广。然而，写这样的短篇小说，对初学写作的作者来说，是比较难以驾驭的，搞不好就容易写成编年史、流水账，堆砌情节，罗列事件，本来非常曲折感人的生活，却写得平淡干瘪。怎样处理好这类题材呢？作者如果确实熟悉这样的人物，掌握了大量的素材，关键就在于作者能不能从熟悉的生活中提炼出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对生活素材进行严格的选择，巧妙地安排人物和故事情节。读一九七九年获奖小说《内奸》，在这方面是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和借鉴的。

《内奸》的作者一开篇就告诉读者“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共产党的将军、干部、农民，有伪县长、土匪头子、日本鬼子的特务、教会医院的医生、国民党反动军官、商人……，是“一个复杂的故事”。然而，当你一翻开这篇小说，一股强大的吸引力非使人读完不可。掩卷思之，它虽然跨度长，但脉络清晰；情节复杂，但首尾相顾；人物众多，但井然有序。作品通过曲折起伏、动听

感人的故事，诙谐地、深沉地记述了一个进步商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境遇，和与共产党的将军纠葛在一起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深刻有力地揭露和辛辣尖刻地讽刺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陷害好人、颠倒黑白的丑恶行径，热情地歌颂了正义与真理，歌颂了党的英明伟大。一个商人的传奇式遭遇，再现了不同历史时代对同样一件事情的两种绝然相反的结论。抗日战争时期心向着共产党、新四军，为革命冒险做过不少好事的商人，和他由衷叹服的新四军的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当作“内奸”、“走资派”、“反革命”。一场场残酷的斗争，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令人神往，令人愤怒，令人发笑，令人思考。这篇小说思想深广，构思别致，取材凝炼，技巧高明。

构思一篇容量较大的短篇小说，从现实生活的丰富素材中，提炼一个明确的主题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有的同志会提出，这样不是“主题先行”吗？有的作家也说过“先有主题是行不通的。”的确，创作一篇小说，如果从政治概念出发，先定出个主题，是违反艺术规律的，沿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作品，逃不出图解政治和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但是，从生活出发，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掌握的材料出发构思的作品，它要反映一个怎么样的问题，表达一个什么中心思想，是不应该把它与“主题先行”混为一谈的。因为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一种自觉的、主动的思维活动，是在社会生活的激烈的冲击之下有感而发的。这个“感”就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所要反映的生活的态度。或喜、或怒、或悲、或怨，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作者对事物的褒贬，反映出作品的中心思想，而这个中心思想，也可以说是作品的主题。有的作家根本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有它们特定的主题，很难设想那为什么要写那样一篇东西呢？把创作看作是下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似乎“玄”了些，

恐在读者中也难以理解。鲁迅曾说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造社会”。当你有了生活，有了素材，进行创作的时候，确定鲜明的主题思想是理所当然的，必不可少的。

《内奸》的主题思想是很鲜明的。小说写于一九七九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四年。经过十年浩劫，全党全国人民都在回顾这段悲痛的年月，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想政治路线，转入四化建设。作品所描写的是十年浩劫中可以说是人人所经历的、耳濡目染的、十分熟悉的生活。那年月，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革命的成了“反革命”，反革命成了“革命”的，真的成了假的，假的装扮成真的，冤案假案遍及每个角落、每个机关单位，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当时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作者和广大读者对这段生活是十分熟悉的。这一段经历使人们都在思考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突然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许多对革命做过不少好事的善良的人们被戴上反革命等五花八门的帽子，被整、被抓、被迫害致死。为什么一伙阴谋家、野心家倒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重现这一段社会生活的斗争情景，作出评价，揭示真谛，已经成为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产生了一大批作品。有的歌颂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有的暴露林彪“四人帮”的暴行；有的写被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悲剧；有的写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来表现这一主题。《内奸》从总体上来看，也是属于这个大的主题的。然而，如何表现这一主题，只能是从各自的独特的生括出发，而不能只从大的概念出发。不少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之所以产生雷同、概念、浮浅，问题恐怕就在离开了“独特的生活”。而

《内奸》的成功就在于作者通过自己独特的生活来表现他所要表现的主题。它没有主要描写老干部如何受迫害，没有以大量篇幅直接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凶残暴戾，也没有写成个人悲剧或穿插家庭的悲欢离合。而是打破禁区，匠心独运，着重写了“一个不干不净的商人”，剪辑了四十年的故事，通过这个商人的遭遇和眼睛，体会和观察了历史的沧海桑田，在波澜壮阔，惊天动地，大忠大奸，红脸白脸，纷纷登台表演的年月，以自己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掂量革命与反革命、真共产党与假共产党。以一系列的可笑而可恨的故事情节，有力地揭穿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假共产党践踏正义颠倒历史的狼子野心。具体地形象地展示了正义战胜邪恶的鲜明的主题。

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整篇作品的灵魂，是构成题材的中心组织的纽带，是贯穿在全部情节和细节中的一条中枢神经。作家在创作时是不可能丢开主题的（尽管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也会改变原来的构思），选择小说的情节是为了表现好主题，创造人物也要围绕主题精心安排，只有这样，作品的主题才不至于变成说教，而是融化在故事情节之中，从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中自然流露，打动和感染读者。所以，如何从生活素材中选择和提炼适合于表现主题的故事情节，精心裁剪取舍，结构成篇。这就要靠作家的思想与技巧的高低了。《内奸》的故事的编织，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设计，是很高明的。象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一个不高明的作者，即使掌握了这样的素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一种可能会以写严司令受迫害为主线，以商人田玉堂为副线；一种可能会写成田玉堂受迫害的悲剧；一种即使以田玉堂为主线，在写法上可能从田玉堂受迫害写起，把解放前的一段用作倒叙，插到中间作辩冤之用；或者也从解放前一直写到粉碎“四人帮”。但效果如何，则很难预测。而

《内奸》的作者却摆脱常习，另辟蹊径，以商人田玉堂为主线反映时代，结构故事。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截取三个不同时代的三件大事：一件是田玉堂眼见共产党、新四军奋起抗日的义举，受到感召和教育，帮助新四军筹办物资、药品，并护送严赤的妻子和儿子转移敌后就医，利用各种关系，采取种种方法，逃过了日伪军特的盘查搜捕，胜利返回根据地，描写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和严司令与田玉堂的一段友好而光明磊落的关系；第二件是在十年浩劫中的一片“横扫”声中，一个在战争年代与革命共过患难的爱国民主人士田玉堂被当作特务、内奸，严司令打成了走资派、内奸，两个人革命的关系变成了反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威逼田玉堂交代他和严赤与日伪的“黑勾当”，田玉堂每次实事求是的忠诚的交代，遭到的却是连续的种种酷刑、拘禁和批斗，然而他回答的还是一句话“我不能昧了良心，不能对不起共产党。”一场场富有戏剧性滑稽的审讯，使他们一无所获；第三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参与迫害田玉堂的风派人物，为了掩盖自己，羞羞答答，敷衍了事，不给彻底平反，不愿认错改错，还想继续整人。田玉堂大气凛然地说道：“我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黄司令员复出，重游旧地，专访田玉堂，田玉堂和当地群众“庆幸又见着老八路和真共产党。”作者紧紧抓住这三件大事，也就是三个典型性的情节展开描写，把十几个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纠缠一起，彼此冲突，强烈对比，生死相连，环环紧扣，使读者对田玉堂的个人命运和整个社会的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即使是写时间幅度大的短篇小说，也必须选择富有典型意义的、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代表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生活片断，把不集中的场景中发生的事件，集中在一个主题的支配下，达到单纯、

紧凑、完整的艺术效果。《内奸》提炼概括的典型化的情节可谓用心良苦。它时间虽长，人物虽多，但集中于围绕三个情节，一个人物，该写的淋漓尽致地泼墨如水，精雕细琢，交代的则寥寥数语，点墨如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尽量避免了写这类小说容易出现的冗长、烦褥、松散的通病。

一篇反映几个不同历史时期人物遭遇和命运的短篇小说，要做到和谐、统一、生动、强烈，把情节自然地贯穿起来，是要颇费匠心的，他不容许一个个自成段落地去描写，而必须把分散而自成段落的情节融化在一起，不至于发生故事游离，彼此割裂，互不相关的现象，使作品自然、纯净，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能否做到这一步，就看作家结构艺术的功夫深浅。《内奸》是按时间顺序一气呵成的，没有一处倒叙。按说这种写法很容易造成平铺直叙，行文呆板。恰恰相反，作者采取讲故事、留包袱、埋伏线、布悬疑、卖关子等手法，使作品波澜起伏，层层深入、步步逼进、扣人心弦。作品的开头是一段引人入胜的生花妙笔，作者用讲故事的方法，交代了这个故事从开始到结尾要写四十年，告诉读者要写五花八门的十几个人物，而且要“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这样一个楔子，既抓读者，又使作品十分自然地进入故事，展开情节。

读者急切地想知道作者要写的是怎样的“不干不净的商人”？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作者对田玉堂的描写，并没有写这个商人的“不干不净”，而是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简练地描绘了这是个“眼睛很神气，舌头也不短，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一带颇有点儿名气的榆面商人”之后，接着写财主家的大少爷严家驹带头闹起了共产党，首先把自家的产“共”了，买枪、买马、买子弹，组织抗日的队伍。回笔写田玉堂对这支队伍由惊奇疑惑到信赖佩服，重新做起买卖，为部队转买

了许多紧张物资。作者用简炼的笔墨把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特定环境以及人物的基调显露出来之后，以浓彩重墨描述一段惊险的故事，田玉堂接受黄司令交给的转移严司令的妻子到敌后治病，他凭着往日做生意弄到的“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高邮湖大土匪高八爺的名片”、“无本生利、坐家拿钱”的生意朋友日本人的翻译郭德富，闯过了道道关卡；利用父辈接济过如今代管美国教会医院的乡邻曹瑞仁住进了仁慈医院，机智地躲过反共分子严司令的堂弟严家忠的搜捕，完成治疗，胜利回到根据地。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惊险故事，使读者看到田玉堂确是资产阶级、鬼子、汉奸、土匪、顽固派”“路路通”的角色，但他过去是为了做生意拉关系，赚大钱，现时是利用这些关系作掩护，闯关卡，为革命做工作。他复杂的社会关系是有点不干不净，但为新四军做事还是忠诚尽心的，在当时有些事非有这样的不干不净的关系的人才能办到。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人们不免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担忧，关注着曾经与他有瓜葛的革命者将受到什么样的牵连？

作者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理，大笔如椽，用“弹指一挥间，三十三年过去了”这样一个大的跳跃，把场景拉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扼要地介绍了前边出场人物的现况后，又着重描绘了田玉堂受到的“一段传奇式的遭遇。”果然不出所料，在那一切都是被颠倒的年代里，为抗日所做的一些好事，都成了可怕的罪名。在一片“你带严赤的老婆到镇江去，目的是什么？”“你们通过什么黑关系进去的，在那里和什么人接头？做了些什么政治交易？接受了什么指令？……”的喧嚣声中，伴随着种种酷刑，开始了一系列的喜剧性的审问。“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人，用反革命严家忠的诬陷材料，诱田玉堂招供时，口口声声“勒令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

责！”当田玉堂夹叙夹诉地“交代”往事，揭穿反革命严家忠的阴谋时，招来的却是拳脚棍棒。反面人物的那种言行自相矛盾，以圣洁的言词掩盖肮脏的行径的丑恶嘴脸与田玉堂坚持“不能含血喷人”、“不能昧了良心”、不“信口胡说”的正直心肠，形成鲜明的对照。辛辣地嘲讽和愤怒的不平互相交织，揪心如焚。大段的审问，虽然都是读者所熟知的生活，但作者没有让人物重叙往事的经过，而是以往事为线索，把重点放在不同人物对往事的不同态度，读来不但没有重复之感，反而使作品进入高潮，人物推向了斗争的旋涡。“大忠大奸，真左假左，各都显出了本相，红脸白脸，乃至三花脸、阴阳脸，纷纷登台表演”，各使解数，一场混战中五光十色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

田玉堂与田有信一段关系的描绘，使作品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林彪摔死了，当年由田玉堂推荐给严赤后当上了税务所长的田有信，做了革委会的一把手，田玉堂自认是老熟人，明白内情，求他帮助解决问题。那知这是个躲在幕后的风派人物，先是冠冕堂皇，满口“公事公办”，“一切言行要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讲什么私人关系、私人路线，一切都是按原则办事”，“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然后是拒不接见。当田玉堂数落了“田主任如何当上税务所长”的事的第二天，竟再一次以“聚众闹事”“乘机翻天”的罪名，巡回批斗。原来就是这个田有信，陷害了严赤和田老板，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在不徇私情的幌子下，暗地里吩咐造反派头头“去妥善处理一下”田玉堂。一个表面看来干干净净、而内心肮脏透顶的丑恶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解开了悬疑，造成田玉堂惨痛遭遇的冤案轩然如释。

作品的结尾，作者是放在下节一起写的。因为时代不同

了，光明战胜了黑暗，“四人帮”垮台了，田玉堂的冤案一定会得到平反，所以，把它列为第三个时期或第三个情节。田玉堂的问题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读者悬着一颗心，关心田老板最后的命运。而作品没有着重去写“四人帮”垮台，黄司令复出，如何为田玉堂平反，却是通过黄司令与田有信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对两面派的嘴脸，进行了一番彻骨的嘲讽，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被扭曲了的人物恢复了本来面目。

当黄司令员问到田玉堂时，田有信却仍心怀鬼胎地说：“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主张彻底平反，可是有些同志还心有余悸，说他是资产阶级、政历复杂、路路通……”

黄司令员接过话头，怒而不显地答道：“对嘛，他是个资产阶级，路路通！鬼子、汉奸、土匪、顽固派，他都有关系，一身泥，一身脏！这都过了几十年了嘛，可是……”将军说到这里连连把手杖狠搞了几下，接着说：“人家的心是向着共产党、新四军的，没有通林彪、‘四人帮’，比那些‘干干净净的共产党员’要干净得多！”

将军和田有信的一段对话，揭示了真理，伸张了正义，呼应和回答了开篇提出的问题，挑开了到底谁是“不干不净”的人，完满地结束了故事，深化了主题，揭示了党内尽管出了大阴谋家、大奸贼，有些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我们的共产党过去是光明的，现在也是光明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显示了真理、正义和道德的强大力量。

构思一篇短篇小说，因各人的思想水平、生活积累、艺术素养不同，有各自的风格、各自的章法，学习和借鉴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从生活出发，找到适合表现内容的艺术方法。

发现·开掘·提炼

——漫谈《工地之夜》的艺术构思

周 劲 馨

建筑一座楼房，必须有一个整体设计，创作一个短篇小说，同样要有一个整体设计，这就是艺术构思。艺术构思是一个复杂的、富有独创性的过程，作家从生活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人物和事件，不断深化对它们的认识，开掘出蕴藏于其中的最本质的东西，从而对主题、人物和情节进行提炼，并采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系列的程序，都是艺术构思的内容。毫无疑问，缺乏精心的艺术构思，是不可能写出好的短篇小说来的；而一切优秀之作，却几乎都是在艺术构思上有其独到之处的。《工地之夜》是杜鹏程长期工作在宝成铁路建筑工地上，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短篇力作。它生动地描绘了司机老赵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表现了一个普通职工对于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是很有思想深度的。小说独具匠心，别开生面，在艺术构思上有着许多宝贵的特点。

发 现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作家深入到某个地方去了，我们满以为他会写出怎样怎样的作品来，但结果他给我们展现的生活图画，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作

家生活在同一个工厂、同一个农村、同一个部队，甚至同时采访一个人物或事件，结果写出的作品，却各具特色，毫不雷同。这里面情况很复杂，但有一点是不能不注意的，就是因为生活是错综复杂、丰富多采的，却又不是什么都可以进入作品的，只有当作者在生活中发现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才能真正引起创作冲动；而且由于各个人的思想、气质、经历不同，他们在同一个生活领域还可以有不同的发现。发现，是艺术构思的开始，是作家进入创作过程的第一步。杜鹏程写《工地之夜》，最初的契机，也是对生活的新的发现。大家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实施的，修筑宝成铁路是当时一项重大的工程。战斗在秦岭山中、嘉陵江畔的建设大军有十多万人，分设无数个工点。这些奇迹的创造者，每时每刻都会涌现大量可歌可泣的事例，他们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业绩，被许多作家描述过，赞美过，而且在读者中发生了积极的教育和鼓舞作用。驾轻车就熟道，去写轰轰烈烈的劳动场景，去写叱咤风云的建设者的雄姿，当然也可以出作品，但不一定有特色。杜鹏程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总想对生活有新的发现，总想去表现生活中新的诗情画意，把新的精神食粮提供给读者，丰富他们的思想情操。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作者对生活有了新的体会。这是一个初冬的深夜，作者跟总指挥一起驱车去参加一个工程会议，汽车在秦岭峡谷中急驰，早已熟悉的司机这时突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想起了司机的一件件小事，他是怎样关心总指挥的，是怎样记着和办着总指挥忽略了的事情，是怎样被人称为总指挥的“活的记事簿”的。杜鹏程从这一些想到了阶级情谊，同志之间的爱，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作者就发现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人，发现了一个同样容

易被人忽视的重要问题。生活触发了作者，作者有了创作冲动，尽管距离创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天地还很遥远，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已经推开了生活天地的一个窗户，通过这个窗口，他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一个别人暂时还没有看到或还没有看得分明的新的领域。他从这里汲取诗情，于是未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了模特儿，主题思想也得到了启示，整个创作过程就这样悄悄地揭开了序幕。发现，使作者在生活中有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转机，我们可以对他的新的成功寄予希望了。

开　　掘

最初发现，诚然是非常可贵的。但认识还有待于深化。这种深化的工夫，自然不是坐在案前搜索枯肠所能达到的。还是要面对生活，对生活进行深入地开掘。生活不负有心人，它向作者提供了又一个机缘，让作家思想的犁铧，楔入到了更深的层次。那是过了一些日子以后，作家在灵官峡遇到了也辛。也辛告诉了他一些新的情况，说那位司机不仅关心总指挥一个人，而且关心整个工程，他对全部工程和各个工点施工的情况都很熟悉，而且为之操劳，在天要下雨的时候，由于想到几个工点会因雨而碰到意外的困难，司机甚至非常发愁。也辛的谈话补充了作者的生活，推动着他跨进了更深层的门槛，使他进一步认识了这位司机，看到了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人公精神，这使作者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是呀；他是一个司机，不是总指挥，也不是工程队长。如果是他们，那样关心工程是并不为奇的；可是作为一个司机，他的任务就是为总指挥开汽车，只要开好汽车，保养好汽车，也就算是尽职了，为什么偏要这样爱管闲事呢？但是，细加分析也不难理解，他